



为蔬菜生产工厂化提供科研手段 哈尔滨建成一座大型玻璃温室

黑龙江省第一座现代化大型玻璃温室最近在哈尔滨近郊建成投入使用。这座大型温室总面积为五千二百七十平方米，建筑骨架全部采用镀锌钢材，具有结构轻、抗腐蚀等优点。温室有电控、供热、保温、喷灌、通风、土壤蒸汽消毒等自动化系统。它的建成，为研究蔬菜生产工厂化，发展寒带地区蔬菜生产提供了良好的科研手段。

新华社记者 胡伟摄

挖潜革新大有可为

改造现有设备扩大水泥生产能力

浙江省江山水泥厂新建一条水泥生产线，比新建同样规模的水泥厂，投资节省一半左右

本报讯 据《浙江日报》报道，浙江省江山水泥厂依靠对现有设备的挖潜改造，扩大生产能力。这个厂在现有年产二十九万吨水泥基础上，又开始新建一条年产十三万吨六标号水泥的生产线，经核定，只需国家投资七百六十八万元，平均每吨水泥的实际投资六元，比新建一个同样规模的水泥厂，投资要节省一半左右，计七百多万元。

江山水泥厂一直生产高标号水泥，是浙江省水泥生产的一个重点企业。为了以最快速度，尽量少的投资，增产更多高标号的水泥，这个厂的党委组织技术力量，全面调查分析了本厂现有的实际生产能力。在调查中发现除回转窑、生料磨这些主机

外，其余不少生产环节都大有潜力可挖。例如矿山从开采、破碎到装运，不需要增添新的设备，就能满足再增产十多万吨水泥的需要。水泥的料浆库和水泥成品库也是这样，经过去年的整修扩建，已拥有了正常生产所需要的储藏能力。这个厂通过挖潜改造，不仅节省了大量的物

上海铁路局积极采取措施挖掘运输潜力

多拉快跑 缓解和运输紧张状况

据新华社上海电 上海铁路局采取多种措施，挖掘运输潜力，以逐步缓和铁路运输的紧张状况。在运输最紧张的“卡脖子”区段和车站，先搞一些花钱少、见效快的项目，是上海铁路局挖掘运输潜力所采取的一项主要措施。例如建设从上海到杭州的沪杭复线预计要花四亿多元，近几年内没有条件动工。这个局就在沪杭线运输最紧张的区段和车站，建设区段复线、会让站和增设站内股道，以此来提高列车的通过能力。去年，沪杭线上有四个列车会让站先后完工，已投入使用。今年又有一处会让站正在施工，一处车站增加股道，一处编组站在进行扩建。

上海铁路局挖掘运输潜力的另一项措施是，利用现有条件，尽量做到多拉快跑。今年以来，全局大力推广集装箱运输，即采用集装箱、集装袋、集装盘等，把货物组合包装起来运输，这样可使装卸效率提高一至三倍，货物存站时间缩短一半多，货运质量也有显著提高。今年一至四月，全局集装箱运输的货物比去年同期增长了百分之九十以上。

重工业靠挖潜



过去多年，我们搞经济建设，口头上讲农业、轻、重，实际上常常是搞重、轻、农。结果，挤了农业和轻工业，最后重工业也得不到很好的发展。现在看来，我们对于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口号，过去在理解上和执行中都存在着一些问题。今后一段时间内，接受过去的经验教训，积累不能太多，投资很难大量增加，适当发展重工业主要靠什么呢？就大部分重工业部门来说，主要是靠挖潜。这里所说的挖潜，是从广义上讲的，包括了挖潜、革新、改造。当然这不是说，所有重工业都不增加投资新建了。重工业中的能源、交通以及建材等薄弱环节，国家还是要较多投资的。

不能一谈搞四个现代化，就想多投资、引进设备、建设新厂、搞大项目。经过三十年的建设，我们已经有了一些相当规模的重工业基础，有了几千万个工业企业。搞四个现代化，要从这个实际出发，充分利用这个基础，通过技术革新和改造，充分挖掘现有企业的潜力。这是我们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唯一正确的途径。

现有的企业负有两个方面的任务。它要为四化提供资金、设备、原材料等物质条件，从这个意义上说，它是老母鸡，要不断地下蛋孵小鸡。它自己还要进行设备更新和技术改造，从这个意义上说，它又是一只蛋，要变成小鸡并成长为大鸡，进入现代化的行列。要完成这两方面的任务，都离不开挖潜、革新、改造。今后的情况将会是这样：通过挖潜，现有企业为四化提供的资金、设备、原材料等物质条件越多，现有企业自身设备更新和技术改造的成绩越大，我国实现四化的时间就越快。

对现有企业实行挖潜、革新、改造，是我们进行经济建设的一贯方针。在这个方针的指引下，老厂“挖、革、改”取得了很大的成绩。许多企业利用有限的财力和物力，在原有基础上，几倍地扩大了生产能力；燃料、动力、原材料的消耗大幅度下降；产品质量提高，品种增加，上缴利润成倍增长，为扩大社会主义再生产作出了很大的贡献。这是一方面，没有把主要注意力放在现有企业的挖潜、革新、改造上面，只想多建新厂，认为不建新厂就不能扩大再生产。其实，把老企业的“挖、革、改”搞好了，扩大再生产的效果并不比新建厂慢，往往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由于在这个问题上缺乏正确的认识，当前就不能坚持“先生产，后基建，先挖潜，后新建”的方针，优先考虑和安排企业挖潜、革新、改造的需要，甚至把用于简单再生产的人力、物力、财力，也用到新建企业的基本建设中去。这是我们长期以来经济发展不快、生产不能提高的一个原因。

对重工业、包括其他工业的潜力，要有足够的估计。最明显的是广大职工长期以来把“左”的政策和统得过的体制束缚着这股潜在的积极性。这方面并不需要增加什么投资，只要解放思想，纠正“左”的政策，在经济体制上进行一些改革，就能把多年没有发挥的潜力挖掘出来。过去统收统支在经济单位所造成的严重浪费，无人关心也无人负责。在一些试点单位扩大企业自主权以后，调动了直接经营者和直接生产者的积极性，很快增产增收，利润增加了，浪费减少了，经济效益是很显著的。

重工业产品大部分是生产资料，过去生产资料是不进入市场的。因此，产销互不见面，不管有没有需要，工厂可以照常生产，物资部门可以照常收购，仓库可以照常积压，表现了生产的盲目性很不明确。工厂领导人只管生产，不问销售；只抓管理，不学经营。今后工厂应该根据市场需要组织生产，对用户负责。工厂要把经营提到重要的地位，主要领导人要管经营。现有的重工业企业只要真正明确生产的目的性，改进经营管理，无论在机械设备、还是技术力量方面，都能挖掘很大的潜力。

挖掘现有企业的潜力，进行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要注意三件事。首先，要根据本地区本行业的规划，从本企业的生产方向 and 实际情况出发，针对生产、工艺技术和厂房设备方面存在的问题，制订经济合理和切实可行的“挖、革、改”规划。其次，所有“挖、革、改”项目，都必须贯彻调整精神，实行专业化协作，发扬本厂的优势，保证做到产品方向对路，不得增加技术力量和原材料的消耗，不得搞“大而全”或“小而全”，不能重复生产。第三，要讲求经济效益，做到花钱少，工期短，收益大，效果好；所有“挖、革、改”项目，都要权衡轻重缓急，本着先易后难的原则，进行统筹安排。

我们的经济建设正在前进。如果说农业战线上的极左流毒已经有所清除的话，那么，工业、财贸、金融领域里的极左流毒还有待于严肃认真地加以清除。要搞好今后的经济建设，要挖掘重工业的潜力，首先要总结三十年的经验教训，继续深入批判极左，解放思想。这一着抓紧，全局就活了。

洛阳轴承厂经济越搞越活

本报讯 据《河南日报》报道：洛阳轴承厂围绕市场调节中出现的新问题，改善经营管理，充分挖掘潜力，企业经济越搞越活。他们采取了三项措施：

一、全厂一盘棋，搞好内部生产能力的调整。洛阳轴承厂今年挖掘内部潜力，对全厂二十多条生产线

进行了调整和改进，改变了过去那种各自为战的生产方式。

二、狠抓产品质量，为用户提供“信得过”的产品。洛阳轴承厂在前两年推广全面质量管理的基础上，今年以来，继续举办质量管理和企业管理学习班，培训干部、工人，人人树立用工作质量来保证产品

质量的严细作风，推动质量管理得过去活动深入开展。

三、节约挖潜降低成本，增加盈利。从实行定额领料、合理运用动能、清查库存、加快资金周转、降低废品等十个方面制定了节约指标和措施，广泛开展以降低成本为主要内容的增产节约活动。洛阳轴承厂在市场调节中，由于不断地打破旧框框，解决新问题，迎来了全厂大好形势。

邓小平副总理会见图普奥拉总理

新华社北京六月十九日电 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西萨摩亚总理图普奥拉·埃菲。

在亲切交谈中，邓小平说，粉碎“四人帮”以后，我们定了一个新目标——在本世纪末实现中国的现代化。现在在全国上

下正在同心同德为实现这个目标而努力。他说，八十年代是我们进行建设的关键年代，也是国际形势十分动荡的年代。我们搞建设需要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我们要在维护世界和平以及其他国际事务中尽我们的义务。

他指出，对苏联霸权

主义不斗争是不行的。在维护世界和平的事业中，需要大家合作，不论国家大小，都有自己的责任，都能做出自己的贡献。

会见后，邓小平副总理设宴招待图普奥拉总理和夫人一行。章含之、魏玉明等参加了会见和宴会。



邓小平副总理会见图普奥拉总理

普及科学知识 推广农业技术

骆伟天到哪儿蹲点哪儿增产

据新华社兰州电 甘肃省民乐县农业技术员骆伟天，一九七〇年以来连续在农村蹲点十年，扎扎实实地推广农业科学技术。他先后蹲过的四个生产队和一大队，粮油产量都大幅度增长。去年，中共民乐县委任命他为县农技站站长，张掖地区行署授予他农业技师职称。

骆伟天在蹲点中，很注意向干部、群众普及农业科学知识，帮助他们克服习惯势力和保守思想。一九七四年他在洪水公社马庄二队蹲点时，针对这个队的具体情况，提出了采用良种、合理密植、科学施肥、实行机械等四项增产措施。但是有些社员，总认为“老品种保险，新品种危险”，“种田看好看，稀田吃饱饭”。在这种情况下，骆伟天耐心地给干部、群众讲解采取这些措施的科学道理和好处，消除了大家的顾虑，使这些措施得到落实。洪水公社刘总旗一队，海拔不太高，气候也不算冷，但庄稼却

种得晚。因为迟播，小麦常因后期涝灾和病虫害而减产。骆伟天决心帮助这里的群众改变迟播的习惯，他先是分析了当地的气象资料，同时又根据小麦生长和成熟的规律，提出了三月二十五日开耕下种的意见。到了播种那天，干部和社员见邻队都没有动静，又拿不定主意了，问骆伟天：“今天真的要种吗？”骆伟天说：“我们要相信科学、尊重科学，不要犹豫不决。”这一天，刘总旗一队的社员在骆伟天的指导下，产量翻了一番。干部、社员也真正信服了。

骆伟天在蹲点中，作风上泼辣辣，生活上朴朴素素。社员吃啥他吃啥，哪里有闲铺他就住到哪里，不提任何特殊要求。每月，除了月头回城领工资，安排一下家务，都住在生产队里，每年至少有三分之一的的时间和农民在一起。干部、社员都感动地说：“老骆一心一意为我们吃苦受累，真是我们农民的好技术员”

梁学智养鹿有功荣获特等劳模称号

新华社哈尔滨六月十八日电 黑龙江省逊克县养鹿场场长梁学智，长期在深山老林为鹿茸出口做出贡献，荣获特等劳模称号。

梁学智在养鹿工作中，刻苦钻研技术，不断创新，鹿茸出口，最近被评为全省特等劳动模范。

梁学智在小兴安岭密林中工作已二十二年，为了多出点优质的鹿茸，他又保护鹿的生长，他和工人们一起研究把鹿和养鹿结合起来，深山老林捕鹿非常艰苦，夏天蚊虫咬，冬天寒风逼人，他尝了吃口冰窖，饿，晚上把马搭子往地上一铺，席地而卧。

有一次他和一只六百多斤大黑熊遭遇，黑熊将他扯倒在地，压在他身上。梁学智临危不惧，机智勇敢地打死了黑熊。在艰苦的环境下，他摸清了鹿的生活习性，总结出的一套安全可靠的方法，捕的鹿成活率高达百分之百。

华总理同图普奥拉总理继续会谈

新华社北京六月十九日电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西萨摩亚政府经济技术合作协定议定书今天下午在北京签字。

我国国务院总理华国锋和西萨摩亚总理图普奥拉·埃菲分别代表各自政府在议定书上签字。

签字后，两国总理举杯，共祝中西两国经济技术合作关系的新发展。

新华社北京六月十九日电 国务院总理华国锋同西萨摩亚总理图普奥拉·埃菲今天下午继续举行会谈。

据记者了解，在两天的会谈中，双方对当前国际形势，特别是波斯湾、东南亚、印支和太平洋地区的形势，充分地交换了意见。

两国领导人讨论了加强两国政治、经济和贸易关系的问题。

双方还对中国最近在太平洋地区进行运载火箭试验一事交换了看法。双方认为，这样亲切友好、无拘束地交换意见是十分有益的。

华国锋总理同图普奥拉·埃菲总理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西萨摩亚政府经济技术合作协定议定书。

新华社记者摄



田屯煤矿实现“千日红”

据新华社济南电 山东枣庄矿务局田屯煤矿，从一九七七年九月五日以来，已经连续一天以上天天完成和超额完成国家生产计划，实现了“千日红”。这在全国是少有的。

池潭水电站第一台机组并网发电

据新华社福州电 福建省池潭水电站第一台万千瓦的水轮发电机组于五月三十一日并网发电。池潭水电站建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根据地泰宁县境内，是一座坝后溢流式厂房的水电站。

中国铁路对外服务公司成立

本报记者 宋 禾 新闻研究生 于 宁

十九世纪末叶的戊戌变法，是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维新运动。它传播了西方资本主义学说，冲击了封建文化，在历史上起过进步作用。

新中国成立以后，对如何评价戊戌变法，一直是近代史研究中的重大课题。一九五八年，为纪念戊戌变法六十年在北京召开的学术讨论会，肯定了民族危亡和促使思想解放的重要意义，阶级局限性，推动了这方面的研究，但探讨还不够深入。在评价上也有偏颇说来，是有成绩的。可是，自从臧本禹写出《“本身”就是剝削压迫劳动人民的主宰者》也是不可能为了人民革命的利益》，也阻挡人民革命运动，把革命消弭于无戊戌变法完全否定。后来，“宣传改良主义削阶级”、“崇洋美国”等帽子随时乱的研究几成禁区。直到“四人帮”被粉碎的拨乱反正和百家争鸣的方针得到贯彻运动后再研究才和百家争鸣重新提出了

评价戊戌变法运动的历史意义和历史事实出发,而不能从原则和推论出发变化的历史,要考虑两个方面。第一,是中日甲午战争以后中国面临瓜分危机主权获得初步发展的情况下发生的,族危亡,发展资本主义,在当时代表着趋势,所以有进步意义。第二,戊戌资产阶级维新派活动的,是从上而下进行,他们的活动仅限于少数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得到了以光绪皇的支持,脱离了广大的人民群众。因此一个软弱改良主义运动。

正由于这样，戊戌变法既要维护帝国主义存有幻想；既反对封建顽固势力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如果我们片面，而忽视另一个方面，就不能对它作确的评价。

戊戌变法运动是中华民族与帝国主义国家斗争的产物。中日甲午战后，帝国主义国家纷纷“租借”海港和筑路、开矿等重要投资特“势力范围”，亡国灭种的大祸迫在眉睫。中国的民族工业开始初步的发展。但是，帝国主义与中国封建势力的勾结和百般压制，民族工业，在其发展初期，就遭到严重的摧

关于戊戌变法的评价问题

汤志钧

救民族危亡，发展资本主义，成为当时最迫切的问题。

变法运动的领导者对帝国主义是什么态度呢？能不能说变法是“崇洋美国”、“引狼入室”呢？康有为在八十八年的《上清帝第一书》中，指出民族危机的严重，指出日本“同仇共书于东，英皇藏卫而顺川滇于西，俄筑铁路于北而迫盛京，法煽乱民于南以窥滇黔”；他鉴于祖国的领土沦丧，“忧愤成积”。甲午战后，“窃闻与日本议和，有割奉天沿边及台湾一省”而发动“公車上书”。德国强占胶州事起，康有为又赴北京，迫切陈言“四邻交逼，不能立国”，“瓜分豆剖，渐露危机”，敲起亡国大钟的警钟。他们的基本态度是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争取中国的独立富强；是为了“要救国”，而提出变法维新的。他们不是“引狼入室”，而是想“拒外夷”，“挽世变”，想把封建的中国改变为资本主义的中国。因此，他们倡导资本主义国家为的物文明，要学习资产阶级的学说理论，这都是针对当时中国的实际情况，具有进步意义，怎么能说是“崇洋美国”呢？

那么，能否说这种“资本主义道路”，是“以此来阻挡人民革命运动”呢？也不能的。历史上“资本主义道路”，是当时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甲午战后退挽救危亡，除了发展资本主义，没有其它道路可走。太平天国的革命运动已经失败；事实上，没有无产阶级领导的农民革命运动，并不能找出一条新的道路。当时，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都才开始产生，都还没有强大到能成为独立的革命力量。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暂时由资产阶级新派承担这个政治任务，谁能说是“阻挡人民革命运动”呢？显然，这种“评论”违反历史事实。

戊戌变法运动也有挣脱封建束缚的要求。当时资产阶级维新派的主要政治任务是挤进统治机构中去的，分享政权。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们提出了“兴民权”、“开议院”、“君民共主(君主立宪)”等主张，都是帮助资产阶级参政预政的手段。为了打通参政预政的道路，就必须对维护封建专制制度的传统观念进行冲击，这是一个有很大意义的进步。有人以为维新派利用“孔子改制”，就是宣传了封建文化。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康有为等力主“更新百度”，反对“率

由章开，主张“守旧而不守礼者斥之，习故而不能改者去之”，是反对封建势力的。他把资产阶级需要的西，挂上孔圣人的招牌，把“述而不作”改为“托古改制”，以减轻“非圣无法”的压力。正如阮元澜同志所说，这“使知识分子从此对封建思想里添加一些资本主义思想，使完全封建思想里，应该添进了一步”。《戊戌变法的历史意义》戊戌变法时期，对旧文化、旧教育的批判，特别是对科举制度和八股文体的抨击异常猛烈。作为资产阶级启蒙运动，是有反对封建主义的性质的。

戊戌变法的启蒙意义，是促使中国知识分子开始思想解放，虽然仅仅迈了第一步，却是值得重视的一步。不过，有人把“公车上书”和“五四”示威游行相类比，我认为这并不恰当。因为前者是辛亥以来彻底的不妥协的反对封建反动运动，而后者则是“启蒙”，后者是马克思主义开始传播时发生的，前者传播的是资产阶级新文化；后者是共产主义的知识分子、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三部分人的统一战线的革命运动，前者则是从知识、官僚转化来的资产阶级的代表者。戊戌变法在历史上起过作用，但它的性质却是改良主义的。他们的领导者很软弱，既不敢于和封建主义决裂，又对帝国主义存有幻想。在平壤地方封建社会中所产生的中国资产阶级，一开始就表现出他们的软弱性和妥协性的阶级本质。

维新派和封建势力有矛盾，但又与之有着密切联系，不能和不摧毁封建制度。他们主张为“天下百物皆出于农”，“亟宜鼓铸良法以救之”（康有为：《清帝第二书》），但根本不提出出土地问题，只是请求设农学、农务学堂以“兴农植本”，小心翼翼地避免损害封建统治权力，希望取得封建势力的合作来从事某种改革。在舆论宣传上，提出不出革命的理论和革命的纲领，仍然以“托古改制”的态度提出；所提倡的“民权”，实际上还是“绅权”。维新派所争取团结的，只是地主、官僚出身的知识分子，所依靠的也只是个并无实际权柄的光绪皇帝，从而只能发出指示、下命令的办法来变法维新，只是在不动摇地主阶级根本权力的基础上求得一些发展资本主义的条件。他们所理想的新政，也只是建立在封建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

领导干部却大言不惭

地进行这样的“教育”：“《准则》的贯彻不能急，总要创造条件，经过一个过程嘛！”我们是唯物论

条件的，我们也承认党能一蹴而就。但是，这不是对一个无产阶级基本的要求，还要等到什么“过程”呢？要讲内应当是主观的、内在的自觉性，要有言行一致。否则，从外部再给你是不可能自然而然转化行《准则》之难，确也有人帮“制造十年动乱”，以致许多是非界限的“哭”、“骂”观念也还用冠冕堂皇的挺不错很蹩脚的《行》。这种状况！怎么能不难呢？

想起小说《乔厂长上任记》的一句话。当谈起长干困难时，他痛切地说：“在空谈家多，实干家少，在那种只说不做、纸上谈兵的影响下，到处盛行着诡辩论的坏风气，对人对党的事业的破坏作用，罪魁祸首是林彪、‘四千人’，群众是没有责任的。当过职业‘空谈家’的人，无知或无奈。追究责任有条例训倒是要认真言行不一、表里不一，‘光说不练’总是要为合格的共产党员和四化下狠功夫练就一身‘言德’的基本功。”

多种流通！
也要有集体

就不会受外人轻视，可以通过“谈判”来改订条约了。维新派幻想不经过于激烈的斗争，就可以改变中国的半殖民地地位，解决帝国主义压迫、束缚中国的国题。只要“内政振兴”，就可以“消除外患”；并且企图依靠某几个帝国主义国家来反对另几个帝国主义国家。这种不切实际的幻想，反映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政治上的软弱。由于这样，维新派在试图挽救民族独立和中国资本主义发展问题时，就只能选择他们看来是最可行的改良主义道路。

资产阶级作为一个新的力量兴起，表明单纯的农民推动历史发展的时代已经过去，但反对封建的广大农民仍蕴藏在农民之中。维新派不但和农民的战斗各不相谋，而且与之对立。康有为即以“陈涉锄耰于陵上”，“揭竿斩木，已可忧虑”为虑，把自己的运动看作具有缓和国内阶级矛盾的意义。他们敌视农民，完全脱离了广大的人民群众，当然经不起反动力量的冲击。这正是中国早期资产阶级软弱、妥协的表现。

戊戌变法是否是改良主义运动，您能说是具有进步意义呢？这要从当时历史条件来寻求答案。十九世纪末，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还没有形成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充当这个阶级的政治代言人只是从地主阶级转化出来的知识分子和部分官僚。维新派之所以采取改良的形式，是由当时的历史情况和阶级力量决定的。这时，资产阶级革命尚未兴起，当革命形势尚未形成、革命要求尚未提出之前，进行这种改良的尝试，不能说它不代表中国社会发展的趋势，也不能因为它是改良运动而削弱了它的进步性质。

如上所述，戊戌变法运动促使了知识分子的思想解放，传播了资产阶级学说，抨击了封建文化，尽管顽固派拚命扼杀，而风气既开，不可阻挡，所谓“京师智识骤开，如万流滔涌，不可遏抑。”（欧史米：《论政变为中国亡之关系》）它对近现代历史是起了推动作用的。变法失败后，人们深深知道“维新终未可从容罢免之理，则不得不望诸民之崛起。”（《苏报·驳革命谬议》）“而天下大势之所趋，其必经过一辄之革命。”（《苏报·康有为》）过去袁世凯、梁思影响的人，有不少投身到革命行列中去。所以，这次运动在中国近代史上的启蒙作用是不能抹杀的。这和戊戌以后的改良主义和改良主义者有严格区别，不能混为一谈。

因此，肯定戊戌变法的历史作用，仅是根据当时的历史条件予以估价，决不意味着我们同意改良主义；对于康有为等维新派，也只能按照他们在这个运动中所起的作用予以适当的历史评价，决不宽容他们此后的反动堕落。

过去，有人说：“使戊戌变法不致推翻，行二十年之新政，或已致中国于富强”(胡适《留学日记》)从“惋惜”这一运动的失败，企图证明改良主义在中国可以实行，这是缺乏事实依据的臆断。脱离当时的社会条件作种种可能的假设，只会陷入唯心论的泥潭。戊戌变法的事实，恰恰证明，在中国即使会有进步意义的改良主义也是行不通的。革命实践已经证明，在中国，反封建的事业只能通过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来完成；而且在二十世纪的条件下，只有通过无产阶级领导的新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来完成。

对于戊戌变法运动，简单的否定，固然不是科学的态度；只看到它改良的一面而忽视其启蒙作用，或者以戊戌变法运动不属于改良主义的范畴，也都是值得考虑的。

 $\langle \bullet \rangle$ $\langle \bullet \rangle$

长期以来，我们对农村的长途贩运，实行限制和取消的政策。

长途贩

“四清”运动中，特别是林彪、“四人帮”横行时期，更把小商小贩、农村的长途贩运，叫做“投机倒把”，当做“资本主义”加以批判，严加取缔，堵塞了流通渠道，妨碍了生产发展和人民生活改善。现在我们要把城乡流通渠道搞活，就要把这个问题搞清楚。

运是投机倒

孙连成

允许农村长途贩运，是我国生产力、生产关系的现状以及农村经济的特点决定的。在现阶段，我国农村的生产力水平很低，商品经济很不发达，交通不便，生产工具、运输工具很落后，由这种生产力水平决定我国现阶段的生产资料所有制，不仅有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社会主义的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还有个体劳动者所有制。人民公社社员还有少量的自留地、家庭副业，在牧区有少量的自留畜。从农产品看，除了粮食、棉花等大宗农产品外，还有很多农副产品和土特产品。这些产品种类繁多，零星分散，季节性强，供应变化很快。所有这些都要农村有多种流通渠道，既要有国营商业、供销社作商业的流通渠道，也要有集体和个体的长途贩运作为必要的补充。

现在农村的农业渠道，除了农民在当地集市贸易互通有无外，只有一个供销社远远不能适应生产发展和人民生活提高的需要。据浙江省十八个山区的统计在一万二千二百四十八个生产大队中，农村商业网点只有六千五百九十七个分区的四十六个点的生产大队没有商业网点，百分之三十七的生产大队平均要里之路才能买到农副产品、购买日用必需品。不但商业网点少，而且商业人员严重不足。山区公社所在地的供销社的棉布百货、副食品等门市部，大多是一个门市部一个点，公社以下的代购代销店也多数是“一人一店”。余姚县四区华山公社采购店，只有一个收购员，还要管三个毛竹临时收购点，每个点都有二十多里山路，收购工作只好处于收收停停的状态。龙泉县住龙供销社只有一个收购员，收购品种八十多种，每年收购金额十万多元。由于供销社商业人员不足，许多社会需要的土副产品没有收购上来，许多山货只好烂在山发生“产区无人要，销区买不到”的现象。据有关部门估计，单是住龙公社由此而减少的收入达四万多元。这些情况都说明，很有必要疏通和发展之间的流通渠道，在国营商业的领导下，允许人民公社、生产大队和生产队自己的或收购的农副产品、土特产品运到城镇销售，同时利用我国农村劳动力优势，允许一部分多劳多计游乡串镇，把千百万种零星分散的农副产品、土特产品收购运到城镇销售。

允许长途贩运是完全必要的，当然，要加强市场管理，运用税收、价格等手段加以引导，发挥它在流通中应起的作用。

重在身体力行

张黎洲

当前，全党和全国人民正在学习、执行《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很多党员干部学、边对照、边行动，雷厉风行地采取了改进工作和作风的措施，群众看了都很高兴。但也有少数同志对上表态，对下动员，激昂慷慨，娓娓动听，可就是迟迟没有多少具体的行动。群众对此不免有些议论，说他们是“嘴功不错，做功不行”。其实，这种评论还是比较客气的。认真说来，嘴功不错的演员，即使做功不行，也还有听众；而那种只会唱高调、没有实际行动的领导，根本谈不上什么“嘴功”，倒象是流行说的“天桥的把式——光说不练”。

最近青年中流传着一个很有针对性、很富鼓动性的口号，叫作“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从点滴做起”。这个口号，就好像在强调在四化建设中，不唱高调，不尚空谈，而重视做功夫，重在行动。它既反映了革命者的一种严于律己、言行一致的精神，又体现了我们党历来重视实践、讲求实效的好传统。在贯彻《准则》中，我们需要的也正是这种可贵的精神和传统。《准则》是每个党员必须遵循的行动规范。在林彪、“四人帮”长期败坏党风，使党规党法荡然无存的情况下，经过总结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制订出十二条准则，这是于党的建设和党员的党性锻炼都具有重大意义的举措。但是，它的价值和威力究竟如何，它的实际作用到底有多大，那还须靠实践去证明。要注重身体力行，要付诸实施，这是对全体党员的要求。这里的关键，是要看各级领导干部是怎样去做，去实践的。因为领导者，领头、引导也。要求

党员做到的，领导者自己首先身体力行；要求党员不去做的，领导者自己首先注意克服；要求全党与之斗争的歪风邪气，领导者站在前头带着大家态度鲜明地进行斗争。当然，这也不仅是发挥领导干部表率作用的问题。各级党员领导干部，受到党的教育时间更长，经受的锻炼更多，觉悟、水平、修养通常都比一般党员更高，理应更加严格地要求自己，在清除林彪、“四人帮”的流毒影响，恢复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进一步提高党的战斗力方面，作出应有的贡献。从领导干部在实施《准则》中的作用和责任来说，前面提的那个口吻，还可再加上一句：“从领导做起”。

《准则》公布之后，广大党员、群众受到巨大的鼓舞，也抱着莫大的期望。“光说不练”的坏习惯，虽属少数领导同志中的问题，但却严重地影响了党员、群众的信心。现在就有这样一种普遍的看法：“《准则》好是好，就怕难做到。”对于这种看法，要进行教育。应当让大家懂得：对于《准则》的贯彻执行，中央有很大的决心，有具体的措施，大多数党组织和党员干部态度是积极的，加以《准则》公布以后，可以得到广大群众有力的监督，我们没有理由缺乏信心。不过，最有说服力的教育办法，还是在切切实实的行动。如果我们的党员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不是说到做到而是只说不到，不是边学边行，而是边学边犯，群众眼看这种“言而无信，行而无果”，“说得好听，做得难看”的现象，怎么能不影响信心呢？最近就听说有这样的事：《准则》公布后，有个单位的领导依然故我，大搞特殊。党员和群众提出了批评，

者，干什么事都是干的拔乱反正不干不搞权术，不谋私利，先进战士的起码的造什么“条件”，给条件，恐怕也是干的条件，即要有起劲，表里如一的精诚创造多少行动，造成什么样的表现。要说有点难啊！林彪、党内生活长期不严肃被颠倒了，一些起摸有的，有人往好的“言”来掩盖自己的况不改变，贯彻《

写到这里，不禁记起中央书记处时期下来的许多我们国家倒楣的事又太少。的确，前一批干不好的荒唐事，一股好尚空谈，人们思想的腐化作风用实在太多了。当作人解”，广大党员人解”，被尊者、贤者的，多数人也是任是没有必要的，总结起来，这就就总是要害己误国的人鄙薄的。要当实干家，唯有下决必行、行必果”的

有《西夏国志》、《西夏图志》、《西夏书事》、《西夏纪》等。此外还有《西夏国史》、《两种海国经记》、《郑和航海图》、《唐大和上东征传》四种，今年准备出版的有《东西洋考》、《西游录》、《异域志》等几种。

(华)

日本影印北宋版《通典》

日本汲古书院决定从一九八〇年起分期影印出版《通典》、《通志》。影印的本相较有日本宫内厅书陵部的藏孤本，与通行的版本有较大文字上的差异，作为学术研究资料，有很高的价值。影印本共分八册，另有单行附录一册，包括有关各版本的研究所。全书约五千页，隔月出版一册。

(明)

出版消息

档案馆、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辑的一部重要史料。全书收录了该馆所藏清代档案五千余件,比较系统地勾勒了清代中俄两国之间发生的各种重大历史事件,是研究清代中俄关系的重要史料。所编档案起自17世纪(公元1661年)迄于20世纪(公元1911年)。按时间先后编排,分作五编。陆续出版:顺治、康熙、雍正三朝为第一编;乾隆、嘉庆、道光三朝为第二编;咸丰朝为第三编;同治、光绪、宣光三朝为第四编;宣统朝为第五编。本书第三编(咸丰朝)已经出版,约九万册,分五册,为中下三册。(文物出版社)

《当代国际人物辞典》即将出版

为了满足广大读者了解国际时事、研究国际关系的需要,这部辞典出版社即将出版《当代国际人物辞典》。这部辞典介绍了世界各国四千四百多个政治、社会方面的人物为主,兼顾其他方面。其中绝大部分是在世的知名人士。全书有一百五十万字左右。

舒敏

也要有集体所有制企业。

现在农村的农业渠道，远远不能适应生产发展的需要，在一万二千二百四十户有百分之四十六点二的生产队五里路山路才能交售农副产品也严重不足。山区公社是一个“山区市部”一个大队，是明山区华山公社采购店，往返都有二十多里山路，收购点只有一个收购员，收购品网点人员不足，许多社会上，发生“产区无要，销区无货”的现象。山区供销社，社员由此而减少的，城乡之间的流通渠道，在把自己的或收购的农副产品多的优势，允许一部分多产土特产收购贩运到城镇销售。

允许长途贩运是完全

也要有集体所有制企业。

现在农村的农业渠道，远远不能适应生产发展的需要，在一万二千二百四十户有百分之四十六点二的生产队五里路山路才能交售农副产品也严重不足。山区公社是一个“山区市部”一个大队，是明山区华山公社采购店，往返都有二十多里山路，收购点只有一个收购员，收购品网点人员不足，许多社会上，发生“产区无要，销区无货”的现象。山区供销社，社员由此而减少的，城乡之间的流通渠道，在把自己的或收购的农副产品多的优势，允许一部分多产土特产收购贩运到城镇销售。

允许长途贩运是完全

除个体的长途贩运作为必要的补充。

除了农民在当地集市贸易必须有外，只有供销社才能和人民生活提高的需要。据浙江省十八个山区县的调查，生产大队中，农村商业网点只有六千五百九十七个，生产大队没有商业网点，百分之三十七的生产大队平均要一个商店，购买日用必需品。不但商业网点少，而且商业网点在地的供销社的棉布百货、副食品等门市部，大多数以下的代购代销店也都是“一人一店”。余姚县四个大队有一个收购员，还要管三个毛竹临时收购点，每个点收购工作只好处于收停待停的状态。龙泉县住龙供销社八十多种，每年收购金额十多万。由于供销社商业主要的土副产品没有收购上来，许多山货只好烂在山里区买不到”的现象。据有关部门估计，主是住龙山区区四万多。这些情况都说明，很有必要迅速发展和完善商业的领导下，允许人民公社、生产大队和生产队、土特产品的领导收购销售，同时利用我国农村劳动力多，把千百万种零星分散的农副产品、山货、土特产品，当然，要加强市场管理，运用税收、价格等经济

